

戴名世

散文选集

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戴名世散文选集

石钟扬 蔡昌荣 选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戴名世散文选集/石钟扬, 蔡昌荣选注.—3 版.
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百花散文书系. 古代部分)
ISBN 978—7—5306—5397—5

I. 戴.... II. ①石...②蔡... III. 古典散文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 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629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67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22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,根深叶茂。它和诗歌一样,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,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,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,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,特编辑这套“中国古代散文丛书”,作为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。

二、散文文体范围,代有嬗变,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,以抒情、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,下迄于清代。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,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,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、演变轨迹。

三、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:一为论文,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、文学活动外,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,分析、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、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。一为散文,每篇均附加题解、注释。

四、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,以论文帮助

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,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,两相印证,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,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,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,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。

五、每书所选散文,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,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题材、风格的文学性散文,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。

六、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、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、出处、版本等外,还对作品写作背景、思想价值、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,加以简明的评述。

七、注释以疏解难字、难词以及典故、职官、器物、人名、地名等为主。对其重要者、用法特殊者,并援引出处或例句,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戴名世和他的散文

石钟扬

人生就是选择。天才未必都选择文学道路，选择文学道路却需要天才。尽管历史也可能给天才以礼赞，而现实赐予天才的却往往是悲剧。

戴名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的作家，但他却在千古奇冤的“《南山集》案”中丧命。关于“《南山集》案”，史家有种种记载，民间有种种传说，连小说家吴敬梓也将之摄入作品，《儒林外史》中《高青邱集》即《南山集》的代称。作为禁书，它简直是灾祸的象征。仅此足见戴名世及其悲剧的巨大影响。

然而，多少年来，戴名世的名字似乎只凝铸在那血迹斑斑的“《南山集》案”上，而他作为一个文、论并茂的古文作家的形象，却鲜有人论及，甚至在桐城派家族里也难以找到他的位置。这就不免在其命运悲剧之上又横添一重文化悲剧。

—

戴名世，字田有，一字褐夫，号药身，别号忧庵，晚年一度隐居于故乡桐城之南山，故世称南山先生。

戴名世于清顺治十年(1653)三月十八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一耕读之家。戴名世在《砚庄记》中介绍了自己的家世：“余家世耕田读书，故称饶裕。余始祖自婺源迁桐，至先王父凡十世，未有以授徒卖文为生者。明崇祯中遭贼乱，家破。久之，先父募人垦荒田数百亩，聊足自给。先人兄弟三人，而先人所分受田宅仅十之二，食指甚多，不能给，于是始授徒他方，以糊其口，而匱空日益甚。”可见，戴名世的童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。贫困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备尝世态炎凉。戴名世在《上刘木斋先生书》中说：“名世家贫，无担石之储，佣书客游，乞食自活，家累二十口，嗷嗷待哺。而乡邦之间、骨肉之际，横逆百端，迂愚固陋，莫必其命。”

好在这个家庭有读书的传统，好在戴名世幼即聪颖，其“忧患怖畏之余，独于文章一事，不敢稍自废弃”(《上刘木斋先生书》)。戴名世“少而多病，家又贫，未尝从塾师学为时文也。稍长，病有间，因穷六经之旨，稍见端倪，而旁及于周、秦、汉以来诸家之史，俯仰凭吊，好论其成败得失”(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)。他在《答朱生书》中也谈及其读书作文情景：“唯是年来好读书，一日不读书，辄忽忽如有亡失；但一得书，往复观玩，可以忘寝食。然家贫，无买书之资，先世藏书，屡经兵火，无复存，存者亦不属仆。又

交游鲜少，无从借观；就令借得一二，居无几何，即归之其人，更增于悒。譬如卒然之间遇异人胜士，相对开怀抱、吐肝胆，有故各散去，不知复何时合。”戴名世在此困境中仍能博览群书。徐宗亮尝言：“先生少负奇气，不可一世，文章学行，争与古人相后先，尤以史才自负，喜网罗明代逸事。”（《戴先生传》）因而，他在青年时代即以文章饮誉乡里。

戴名世二十岁那年，为生活所迫，子承父业，当了塾师。“而生徒来学，惟时文之是师”，他也只好学时文写时文了。但他“见近日所雕刻流传、习熟人口者，卑弱不振，私窃叹之”（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），因取先贤尤其是左光斗之时文，心摹手追，奉为主臬。他在《左尚子制义序》中说：“忠毅所为文，超然独出尘埃，盖其生平好为清真切实之文，深入骨理，尽落皮毛，而刚劲之气不可遏抑。余少从事制举之文，辄取忠毅之遗编，时时诵法之不倦。”并“以其平日所窥探于经史及诸子者，条贯融释，自辟一径而行”，因而深得博雅君子潘木崖及县司教王我建之称誉，以为堪与“以雄峻古雅之文登高第，为天下宗仰”的韩荃相比拟。不久，韩荃也折行辈与之相交，戴名世的时文也得以风行天下。

即使如此，戴名世仍良多感慨，再三声明：“余非时文之徒也，不幸家贫，无他业可治，乃以时文自见。失足落人间，究无救于贫困。”（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）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，进一步认识和剖析了时文之弊，并由时文而科举而文风而士风而吏治而国家兴亡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他慷慨激昂地指出：“时文兴而先王之法亡”（《汪武曹稿

序》),“自科举取士,而有所谓时文之说,于是乎古文乃亡”(《甲戌房书序》),“自科举之制兴”,“而风俗之颓、人才之不振,其流祸至于不可胜言”(《送刘继庄还洞庭序》),以至说:“讲章时文,其为祸更烈于秦火”(《赠刘言洁序》),甚至提出“进士亡国”论,大声疾呼:“欲天下之平,必自废举业之文始”(《吴七云制义序》)。戴名世对时文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,对封建士子“有剽窃之文,工侧媚之貌”、“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”的丑态,也给予了尖锐辛辣的讽刺,连缀起来,不啻一部浓缩的《儒林外史》。戴名世亦不愧“秉持公心,指摘时弊”之巨匠。

戴名世对时文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上,而是提出“以古文为时文”,即以古文理论改造时文、以古文替代时文的文章改造工程。一为稻粱谋,一为古文改造时文之实践。戴名世实则在相当长时间内从事着时文写作与选编工作(因而他的古文理论不少见诸于时文选本序言),以至他在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中清醒地说:“余自年二十以来,于时文一事耗精弊神,虽颇为世所称许,而曾无得于己,亦无用于世。”可见戴名世在战胜自己的同时,向时代挑战的勇气。

批判时文也好,改造时文也罢,戴名世都是站在古文立场上的。他以振兴古文为己任,而致力古文理论建设与古文创作。他在《疑解》中借“客”之口称许自己“年不满三十”时就“穷古今,讨《坟》、《典》,读百家之书”;“修身洁行,敦厚浑朴,文章贍逸,气盖百代”。在《初集原序》中也说:“余生二十餘年,迂疏落寞,无他艺能,而窃尝有

志，欲上下古今，贯穿驰骋，以成一家之言，顾不知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，妄欲追踪古人”，并自信地说：“假令天而不遗斯文，使余得脱于忧患，无饥寒抑郁之乱其心，而获大肆其力于文章，则于古之人，或者可以无让。”戴名世的古文不仅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，而且有着锐利的现实锋芒。他说：“名世生于山林岩石之间，独立无与，徒以年少志大，不肯稍有苟且雷同，所为文字尤不悦世俗”（《上刘木斋先生书》）。岂只是“不悦世俗”？其“愤世嫉俗”处，简直堪称“干预生活”的狙击手！

性格就是命运。戴名世的为人为文，实在影响着他的命运，虽也不乏称誉者，但更多地表现为与世俗之不相容。他在《成周卜诗序》中说：“余生平用意多悲，与世往往不合，人之所不趋者就之，人之所必争者去之，萧疏寂寞”；“抱其无用之书，负其不羁之气，挟其空匮之身，入所厌薄之世，则在家而穷，在邦而穷”（《穷鬼传》），因而长期处于困顿孤独之中。青年时代居乡，“以文章得罪朋友”，有妒才者号于市曰：“逐戴生者视余！”群儿从之纷如，以至“为乡里小儿所欲杀”（《送朱字绿序》）。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已三十四岁的戴名世因督学使者李振裕的推荐，以岁贡生入太学。在太学期间，他与朱书、方苞等被号为“狂士”，尤其是他“疏慵颓放，即己亦自厌之而不能改。宰辅大官相见，一揖之外无他语。酒酣论世事，咄嗟吁嘻，旁若无人，人颇怪之”（《北行日纪序》），致使“与世多齟齬，诸公贵人或且有无故而欲摧折之”（《刘退庵先生稿序》）。因此，只能眼看他人“历阶而升”，而自己仅被选为补正蓝旗教习，考授知县。同年（即康熙二十六

年)应京兆试,因主考官不喜而被黜,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幕僚与选政生涯。

戴名世在《与弟书》中对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做了深刻的概括:“余生抱难成之志,负不羁之才,处穷极之遭,当败坏之世,而无数顷之田、一亩之官,以托其身。”困顿的处境激起的逆反心理使之意气豪迈,且以经世致用为旨归,“欲尽庇天下之人,使无失其所养”(《种树说》);炎凉的世态,又使之“少而狂简,多幽忧之思,厌弃科举,欲为逸民以终老”(《意园制义自序》)。虽然这两项志愿都未得以实现,但仕与隐(或曰出世与入世)的矛盾却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,映照在他的作品之中。

戴名世长期处于两难之境,欲仕不成,欲隐不能。直到康熙四十一年(1702),友人赵良冶以戴名世十五六年来存在他身边的一千两银子,为其在桐城南拙冈(即戴名世所称的“南山”)买地五十亩、房宅一座,称之为“砚庄”。门人尤云鹗也将平日所藏老师的百余篇古文抄本雕刻行世,即《南山集》。康熙四十一年冬,戴名世卜居砚庄,拟隐居著书终老。这时他已年满半百。可惜戴名世只隐居半年即出山——一以生计所迫,一以经世之志未泯。他出山之后,一边继续从事选政,一边重蹈科举之途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戴名世以五十三岁中举,但次年会试即落榜,三年后才又得中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

不料两年后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“《南山集》案”。康熙五十年(1711),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奏戴名世“妄窃文名,恃才放荡。前为诸生时,私刻文集,肆口游谈,倒置是非,语多狂悖,逞一时之私见,为不经之乱道。”所谓“狂

悖”云云，据《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》记载，指戴名世在《与余生书》中批评清廷处理南明历史地位之失，而欲独撰一书，“以成一代之全史”。但这封信是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之作，至中举之后，戴名世对清廷之态度早随“康熙盛世”的出现而发生转变，其仕清就是明证。赵申乔从其前期作品中觅得，实出于个人恩怨，因为戴名世会试第一，而殿试只得了个“榜眼”，状元却被文名远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熊诏取得，时人颇疑赵申乔舞弊。赵申乔惟恐败露，故欲借刀杀人。其上书中说“臣与名世素无嫌怨”，正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式的拙劣表演。兼之戴名世一贯与世俗不相协调，“同时多忌先生名者力挤之”。康熙对知识分子既有优容的一面，又有防范乃至镇压的一面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戴名世碰到刀口上，几经周折，即使是时为文渊阁大学士的李光地“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，卒不可得”，终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十日（1712.3.16）被斩于京师。“刻日行刑，亲戚奴仆皆避匿”，惟文友杨千木雇车与戴名世同赴刑场，刑后“捧其首而棺殓焉”（方苞《杨千木墓志》）。戴名世之弟戴辅世自京师扶柩归葬于桐城砚庄之南。

戴名世死后，后人以“宋潜虚”之假名保存其文稿，其乡里后学尤多致力搜集，故于专制之淫威下，其著作虽屡经禁毁，仍得以流传不绝。

二

戴名世博学多才，在散文理论方面“自成一家之言”，

系以“率其自然”为主旋律，而以率其自然而立诚有物，率其自然而道、法、辞合一，率其自然而精、气、神并重为三部曲。其间不仅洋溢着“我之为我”的主体意识，而且富有相辅相成的辩证观念。

在散文的思想内容方面，戴名世主张率其自然而立诚有物。何谓“自然”？戴名世在《与刘言洁书》一文中说：

君子之文，淡焉泊焉，略其町畦，去其铅华，无所
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。仆尝入乎深林丛薄之
中，荆榛罥吾之足，土石封吾之目，虽咫尺莫能尽焉。
余且惴惴焉，惧跬步之或失有也。及登览乎高山之
巅，举目千里，云烟在下，苍然茫然，与天无穷。顷者
游于渤海之滨，见夫天水浑沦，波涛汹涌，惆怅四顾，
不复有人间。呜呼！此文之自然者也。

这里“淡焉泊焉”，既指文章的艺术风格，更指人的思想感情之本来面貌。戴名世认为，人的思想感情不应被“町畦”、“铅华”——这些思想上的荆榛、土石所罥挂、封闭，而失其本来面貌；它应像高山之巅的云烟、渤海之中的波涛，自由涌荡于天地之间。那“倡情冶思之出于（心之）自然”（《吴他山诗序》），“性情之真，自时时流露于其间”（《四逸园集序》）的文章，即为自然之文。

文贵“率其自然”，却非仅抒一己之私情，因而戴名世又提出“立诚有物”的主张。所谓“有物”，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。戴名世在《答赵少宰书》中说：“‘君子

以言有物而行有恒’。夫有所为而为之之谓物,不得已而为之之谓物,近类而切事,发挥而旁通,其间天道具焉,人事备焉,物理昭焉,夫是之谓物也。”用现代语言说,就是要求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。所谓“立诚”,则指作家的主观修养。何谓立诚?在他看来,首先要求作家是诚人。在《与刘大山书》中,他以破产习艺而终“抱琵琶而饿死于秦淮之涯”、与艺术共同着生命的余叟自许,认为一个真正的古文作家应当“一心注其思,万虑屏其杂”(《与刘言洁书》),“捐其近名之心,去其欲速之见,夫如是而其去古也不远矣”(《再与王静斋先生书》)。其次在于忠实地把握世态人情。一个好作家,“其于事变乃知之也悉,其于情伪乃察之也周,而后举笔为文,有以牢笼物态而包孕古今”(《方巢逸先生诗序》)。立诚才能有物,才能率其自然,所以戴名世在《答赵少宰书》中又说:“惟立诚故有物。苟其不然,则虽菁华烂熳之章、工丽可喜之作,《中庸》之所谓‘不诚无物’也,君子之所不取也。”

在散文的创作方法上,戴名世主张率其自然而道、法、辞合一。

就创作方法而言,戴名世的“率其自然”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:其一,文尚独创,而反雷同。戴名世在《初集原序》中说:“世之学者,其天之所与既不逮古人,而又无好古之心,往往肆其胸臆,好高自大,又或拘牵规矩,依傍前人,曰:‘吾学某,吾能似某。’寸寸而比之,铢铢而称之,然而未尝似也;即一一似之,而我之为我者尽亡矣!”

其二,文无定格,反对以格言文。他在《小学论选序》

中指出：

夫文章之事，千变万化，眉山苏氏之所谓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其驰骋排荡、离合变灭，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。既成视之，则章法井然，血脉贯通，回环一气。……

天之生人也，妙合而凝，形生神发，而必预立一格以为人，曰：如是以为首，如是以为项，如是以为腰腹，如是以为股肱、手足也，而人之生者少矣。故曰，文章不可以格言也；以格言文，而文章于是乎始衰。

这段论述相当精彩，由此可见，文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，犹如一个“血脉贯通，回环一气”的“生人”，如按时文作法，将它肢解为多少股，就会断送其生命。就创作过程而言，是文成而法之，如同造化育人，“妙合而凝，形生神发”，而不能预立一格，预立一格就难以成文；就具体创作方法而言，则是千变万化的，各种方法均可自由发展，文章之“波澜意度，各有自然”，而不应互相排斥，如“言铺叙者则拙凌驾，言凌驾者则拙铺叙”（《丁丑房书序》）。为文是否能率其自然，这不仅关系一文之成败，而事关整个文运，因而戴名世说：“以格言文，而文章于是乎始衰。”

文无一定之法，却有一定之妙，这“妙”中就有可循之规律在。戴名世于是在《己卯行书小标题序》中演绎明末艾南英之说，提出道、法、辞三者合一的创作方法。他说：

在昔选文行世之远者，莫盛于东乡艾氏，余尝侧闻其绪言曰：“立言之要，贵合乎道与法。而制举业者，文章之属也，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，又将兼有辞焉。”是故道也、法也、辞也，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。

在戴名世看来，无论是时文还是古文，都应承担起“载道”的使命，而且二者所载之道并无根本区别，因而说“且夫道一而已”。当文章的思想内容确定之后，其艺术形式（即“法”与“辞”）就变为决定性因素了。时文以媚俗之辞、僵死之法（御题之法）为之，“欲使之阐明义理之精微，固难矣”，实则破坏了道、法、辞的统一。而古文则古雅之辞、灵活之法（行文之法）为之，使精微之义理得以发挥光大，如“飞泉峭壁，幽岩好石，得以效其奇于人间”（《陈大士稿序》）。这样就达到了道、法、辞三者完美的统一。

文固无定格，而贵率其自然；但率其自然又不能如脱缰之野马，必须驰骋在道、法、辞三者合一的轨道上。

戴名世在《张贡五文集序》中还借山间卖药翁之口，提出一重要的为文之道：割爱。以为它较陆机之文论更为精当，由此能识文章真谛秘钥，且够文章之士终生受用。实则他是以率其自然而道、法、辞三者合一为标准进行“割爱”，于思想内容方面必须割去背义伤道，有损道、法、辞统一之物；于艺术形式方面，必须割去工丽辞采、激越议论、驰骋才气、有伤自然之美之辞。

在散文的艺术境界上，戴名世主张率其自然而精、气、神并重。

于散文的艺术境界，戴名世追求的是本色之美、自然之美。他在《章泰占稿序》中将自然之美归结为“平质”二字：

质者，天下之至文者也；平者，天下之至奇者也。
莫质于素，而本然之洁，纤尘不染，而采色无不受焉；
莫平于水，而一川泓然，渊涵淳蓄，及夫风起水涌，鱼
龙出没，观者眩骇。

自然美作为一种艺术境界，它既不同于生活的自然形态，更不能是“枯槁顽钝”，而要求于质中见文，于平中见奇。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（唐·李白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），“毛嫱、西施，天下之至美丽者也，然而无所事于粉白黛黑”（《再与王静斋先生书》）。对于自然美的艺术境界，“非世俗之所能为，亦非世俗之所能识”，“世俗莫不好文而恶质，好奇而恶平”，他们或于文中求文，于奇中求奇，结果适得其反。

但什么样的自然美才能称之为“至文”、“至奇”的艺术境界呢？戴名世又提出了精、气、神三者“炼之凝之，而浑于一”的观点。所谓“精”，指对语言的锤炼。文学艺术，就是语言的艺术，戴名世主张彻底清除“邪伪剽贼”这些语言垃圾，使之达到自然而精美的程度，即雅且清。他在《己卯科乡试墨卷序》中进一步说：“且夫言之行世而垂远，则又不可以无文。君子冥心孤诣，其于古人之载籍，沉浸醲郁，得其精华而去其糟粕，举笔为文，洒洒自远，虽历年之多而常新不敝。此所谓择焉而精者也。”只有锤炼